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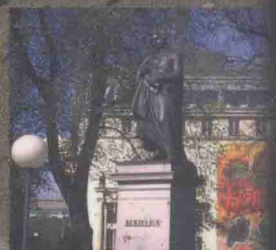
文昭
史明

39

二十世紀的史學



格奧爾格·伊格斯 (Georg G. Iggers) 著
楊豫 譯



二十世紀 的史學

Georg G. Iggers 著

楊 豫 譯

二十世紀的史學

作者 / Georg G. Iggers

譯者 / 楊 豫

發行人 / 謝俊龍

責任編輯 / 鄭美珠

出版 / 昭明出版社

106 臺北市溫州街 75 號 3 樓之 4

Tel : (02)2364-0872 Fax : (02)2364-0873

登記證 / 北縣商聯甲字第 〇八八〇五六一七 號

總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 2 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Tel : (02)2795-3656 Fax : (02) 2795-4100

出版日期 / 2003 年 5 月 第一版第一刷

定價 / 280 元

網站 / <http://www.clio.com.tw>

E-mail / reader@clio.com.tw

※版權為知書房出版集團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缺頁、製幀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二十世紀的史學／Georg G. Iggers 著，楊豫 譯. --
第一版. --臺北市：昭明，2003 [民 92]
面；公分. --（昭明文史；39）

譯自：*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or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ISBN 986-7746-06-6 （平裝）

1. 史學

601

92004920

中文版序

本書是我於七〇年代出版的那本著作《歐洲史學新方向》（一九七五年）的續篇。本書的原書名是德文版著作《從歷史主義到歷史的社會科學》（一九七八年），但經過了增補和修改，把本書所敘述的美國史學的發展方向增補進來。本書提出以下的看法，上個世紀中葉以後，史學思想脫離了那類只關注於政治事件的歷史學科的舊模式，成為了更大範圍的敘事史中的組成部分。這種敘事史採用分析的方法對歷史進行研究，重點放在社會結構和社會進程的內容上。但是，到一九九三年本書的德文版出版時，史學研究的狀況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北美和歐洲，對社會科學歷史學所抱的信念，即認為這樣的歷史完全有可能使用嚴謹的科學方法去研究過去的信念已經發生了動搖，不再相信歷史是一個統一的和連續性的進程。就在電腦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有力工具的時候，試圖把計量的嚴謹性引進歷史學的種種努力遭遇到了挑戰。這些挑戰緣於人們開始考慮需要使用一種新的方法來描述人類存在的定性

方面的內容，因而與計量方法是格格不入的。德國的歷史研究認真地採用了社會科學的方法，稱作歷史的社會科學（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試圖去分析導致國家社會主義興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大屠殺的那些社會力量。人們對美國所取得的繁榮以及階級衝突的消失所抱持的信念則反映在美國的歷史社會科學中。然而，各種形式的社會科學的歷史學所依據的理論前提隨著六〇年代以來政治、社會和知識領域中所發生的轉變而消失殆盡。其中一個重大的轉變是在信息技術革命化時代裡經濟所發生的轉變，取代了舊式的生產方式，加速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全球化。隨著經濟的轉變，造成了貧富之間的更大差距，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初期階段在對社會的看法上所取得共識也消失了。

上面所說的貧富差距的拉大不僅發生在最先進的工業國家，也出現在過去的殖民地地區。於是，舊式的史學受到了批判，因為它的研究領域太狹窄，只集中精力去研究政治權力的中心。不僅如此，社會科學的歷史學也受到批判，因為它不加批判地盲目相信社會和經濟的現狀，因為它漠視許多人的生活經歷。隨著美國和南非民權運動的興起，隨著女權運動的興起，新興的力量出現在政治和經濟舞台上，對越南等過去的殖民地世界的人民為爭取自決而進行的抗爭給予同情。最後，當然並不是最不重要的，人們對急劇成長的經濟中所帶有的生態危險也開始有了警覺。社會史現在擴大到了文化史，而文化不再僅僅被理解為上層的文化，而是從日常生活方式的角度來加以理解。這就需要新的方法論，以便對其研究對象的重

要性給予更多的強調。社會科學歷史學集中研究的結構和進程讓位給了有人類面孔的歷史學，社會科學歷史學對經濟學和社會的嚴重依賴也轉變為更加依賴於人類學和語義學。為此，本書考察了歷史研究在二十世紀最後三十年裡發生的方向性的變化。

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的歷史學家認真地寫作歷史。他們一邊依據史料進行著他們的工作，一邊在探索著新的研究領域。與此同時，大致上可以稱作後現代主義者的哲學家 and 文學批評家們，而不是從事實際研究工作的歷史學家們，發起了一場前沿性的理論攻擊。在他們看來，所謂的真實的歷史根本就不存在。自從歷史學在十九世紀成為一門學術性的學科以來，有兩種基本理論在指導著歷史研究。但是，這兩個基本理論都遭到了後現代主義的攻擊。第一種理論是從啟蒙主義運動以來一直在指導著絕大部分歷史研究的觀念，認為歷史是統一的和連續的。「敘事史的大師們」都是從遠古開始到現代世界的發展進程來觀察歷史。他們往往有一種傾向，就是忽視了別的民族也有自己的歷史。這裡可以不容置疑地指出，這樣的理論構成了一種狹隘的觀點，把世界的歷史僅僅看作是西方的歷史。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所寫的都是範圍狹窄的微觀歷史，敘述那些在宏觀歷史中不屑一顧的細瑣的事件。事實很明顯，歷史絕不止一種。包括人類生活各個方面在內的歷史可能有許多種。然而這些都被當作非歷史的內容而被拋棄了。

但是，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等批評者走得更遠，聲稱歷史純粹是一團漿糊，混亂

不堪。他還斷言，把細瑣的歷史及其宏大的背景聯繫起來的種種努力都是毫無意義的。然而，歷史學家們所做的只能是這樣的事情。不過，第二類批評觸及到了歷史學家工作的核心問題。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等一批史學理論家正確地指出了每一個歷史描述都帶有文學的特徵。他們還進一步提出，在歷史和虛構之間並沒有根本性的差別。懷特認為，歷史意識是西方特有的偏見，是爲了證明西方統治其它文化的合法性。不過，他也提出了一點正確的看法，那就是承認每一個歷史描述都是以歷史學家的主觀思想爲媒介。其他一些人，例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則認爲文本之外沒有歷史，而這些文本與過去的歷史毫無關係。無數的文本要麼都帶有揭示真相的同樣價值，要麼都缺乏這樣的價值。

本書嚴肅地對待後現代主義對現有的歷史研究的實踐所提出的挑戰，但也批判了這些挑戰所帶有的極端的認識論上的相對主義。無庸置疑，歷史的真實的過去確實是存在過的，包括人類過去如何生活，如何感覺以及如何行動，這些都是無法直接獲得的，因此需要主動地重新建構，而後者始終帶有主觀和觀念的成分。這就對歷史的客觀性造成了限制。然而，我們也應當承認，建構真實歷史的複雜程度超過了蘭克式的傳統歷史學家對它的想像。重構過去是高度多元化的，但並不是純粹的想像和臆造。

於是，對過去的歷史有了多重的解釋，但所有這些解釋都必須依據證據，都必須運用在觀念上可以相互交流的探索邏輯。後現代主義的批判中帶有對啓蒙主義遺產的激烈批評。不

可否認，他們對啟蒙主義和現代性的批判包含著合理的成分，但批判者往往會把洗澡水連小孩一同倒掉。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諾（Theodor Adorno）在〈啟蒙主義的辯證法〉（一九四四年）一文面對德國發生的種族大屠殺，卻非常片面地描繪了啟蒙主義運動的圖景，強調了它的科學的一面，卻忽視了它的人道主義精神。傅柯（Michel Foucault）和德希達也描繪出了同樣的圖景。他們忽視了啟蒙主義運動中的正面因素，即主張通過理性和教育去推動人類的解放。他們抨擊了現代文明，並有意地列舉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等思想家，指出他們對理性和民主的抨擊為二十世紀的政治野蠻主義鋪平了道路。本書一方面認識到了啟蒙主義的遺產中存在著相互矛盾的各個方面，但也恰如其分地為啟蒙主義精神辯護，表達了作者對理性探索和人類尊嚴的嚮往。由於本書的第一版是在近十年以前出版的，而我的觀點在這個時間裡已經經過了某些修正。本書力圖克服大多數歷史學史著作中僅局限於本國史學的狹隘性，試圖從國際比較廣闊的角度去觀察歷史思想和歷史寫作。儘管如此，我本人的表述還是限於歐洲和英美。

西方研究歷史的方法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已經對非西方世界、包括東南亞、伊斯蘭世界、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是，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是簡單地採納西方的歷史研究方法。相反地，它與各國的本民族傳統發生了互動，而這些本民族的傳統，諸如印度對部屬的研究那樣，與「後殖民主義」對西方現代性的批判結合在一起了。

因此，儘管本書已經取得了它應有的地位，但必須還有一本範圍更為廣泛的著作來取代它。

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我目前正在與我的同事王晴佳合作寫作一本新的著作。王晴佳先生是華裔美國歷史學家，在中國和美國都接受過歷史學的訓練。我們寫作的這本新著作將從比較的角度，把它放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對十八世紀以來各國的歷史寫作進行考察。這項研究的核心是西方歷史思想與非西方歷史思想的相互影響。這本著作將對東亞國家的史學，尤其是中國的史學給予相當多的關注，包括其高度發達的歷史研究傳統，在對西方的影響做出反應的同時又不喪失自己的本色。在這個項目的研究過程中，我得以與中國、日本、韓國的歷史學家保持密切的接觸。我與這些國家的歷史學家的聯繫是在二十多年以前建立起來的。在一九八〇年的國際歷史學家大會上，我與張芝聯教授為成立史學史國際委員會而密切合作。此後，張芝聯教授來到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進行訪問並在我所主持的史學研究班上與學生見面，我們之間從此一直保持著聯繫。作為回訪，我也訪問了北京大學並講授史學課程。一九八二年，北京首都師範學院（現為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的齊世榮教授在我所在的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歷史系客座達半年之久。一九八四年，我攜夫人應邀前往北京首都師範大學訪問六個半星期。在訪問期間，我還應邀在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和南京大學舉行講座。一九八九年，我的兩本著作譯成中文出版。一本是《歐洲史學新方向》，另一本是我參與主編的《歷史研究國際手冊》。

最近幾年，我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的陳啓能教授和姜芄教授以及他們的史學研究室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二〇〇一年，我參加了楊豫教授組織的在南京大學舉行的以「二十世紀史學」為主題的國際史學會議。借這次參加會議的機會，我還訪問了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北京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和復旦大學並舉行了講座。我非常高興這本書的中文譯本的出版，並希望進一步與中國同仁密切合作。

Georg G. Iggers

二〇〇二年九月於水牛城／哥廷根

序言和致謝

本書的德文版出版於一九九三年並立即譯成了中文、日文和西班牙文。一九九〇年四月在費城哲學聯合會舉辦的研討會上，我向討論小組提交了一篇題為〈理性與歷史學〉的論文，著重討論了後現代主義對歷史研究挑戰的問題。本書的德文版就是以那篇論文為基礎。但是，本書的英文版並非是那個德文版的單純譯本，從許多方面來看，它完全是一本新的著作，是我在本書的德文版出版以後的三年中閱讀了更多的著作，進行了更多的討論，並吸收了對德文版的批評意見後而產生的成果。

這裡需要做兩點說明：儘管本書試圖從國際的範圍對歷史思想進行比較性的考察，但我仍然把考察的範圍限制在我所能閱讀的語言範圍內。我閱讀的著作著重於英國和北美、法國和比利時、還有說德語的中歐和義大利，間或也參閱波蘭文或俄文的翻譯著作。即便是在這些語言範圍，我對作者的選擇也是相當挑剔的，主要是閱讀那些能夠代表歷史學研究重要趨

勢的作者所寫的著作。

在過去的六年裡，我的學生和同事寬容地等待我對自己的論點進行檢驗。他們對我的初稿進行了評價。對此我十分感謝。我要特別感謝在萊比錫大學參加我主持的講習班的全體成員，因為我在一九九二年夏天以後在那裡訪問的一個學期裡，他們閱讀過了我這本書的德文版初稿並提出了寶貴意見。我應當感謝大西洋兩岸以及日本的許多同事，他們也閱讀了我的初稿並提出了批評意見，其中包括威爾納·貝特霍爾德（Werner Berthold）、傑拉爾德·狄塞納（Gerald Diesener）、克里斯托夫·狄佩爾（Christoph Dipper）、沃爾夫岡·恩斯特（Wolfgang Ernst）、達格馬爾·弗里德利希（Dagmar Friedrich）、秋良早島、沃爾夫岡·哈特維格（Wolfgang Hardtwig）、弗蘭克·克拉亞爾（Frank Klar）、沃爾夫岡·基特爾（Wolfgang Kötter）、喬納丹·南努岑（Jonathan Knudsen）、伊里斯·皮林（Iris Pilling）、盧茨·拉斐爾（Lutz Raphael）、安妮—卡特琳·里希特（Anne-Katrin Richter）、漢斯·施納爾（Hans Schleier）、烏爾里希·施奈肯納（Ulrich Schneekener）、費爾南多·桑切斯·馬爾科斯（Fernando Sánchez Marcos）、克里斯蒂安·西蒙（Christian Simon）、斯特拉斯（B. Strath）、魯道夫·馮·撒登（Rudolf von Thadden）、威埃布克·馮·撒登（Wiebke von Thadden）、埃多亞爾多·托爾塔羅洛（Edoardo Tortarolo）、約翰·馮·德贊德（Johan van der Zande）以及彼得·沃爾特（Peter Walther）。奧塔維婭·尼可莉（Ottavia Niccoli）就義大利當前的社會史和文化史研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議。我願藉此機會向她致謝。我發

現哥廷根的麥克斯——普蘭克歷史研究所是個理想的地方，我不僅在那裡完成德文版和英文版的大部分內容的寫作，而且找到了相同志趣的人，也獲得了動力。承蒙該研究所的允許，我參閱他們那所傑出的圖書館裡的藏書，而且為我提供機會與閱讀過本書的全文或大部分章節的學者們進行討論。

他們當中有漢斯——艾里希·貝德克爾（Hans-Erich Bödker）、阿爾夫·呂特克（Alf Lütke）、奧托·傑爾哈特·奧埃克塞爾（Otto Gerhard Oexle）、于爾根·施隆鮑姆（Jürgen Schlumbohm）和魯道夫·維埃爾豪斯（Rudolf Vierhaus）。約爾恩·呂森（Jörn Rüsen）曾邀請我到比勒費爾德大學參加那裡的跨學科研究中心舉辦的多次研討會，與他的交談更使我受益非淺。本書德文版的編輯，萬登霍埃克與魯普雷希特出版社的溫福里德·赫爾曼（Winfried Hellmann）是一名傑出的編輯。在本書的德文版出版之前，我們多次會晤。他也提供了尖銳的批評意見。彼得·柏克（Peter Burke）撥冗閱讀了我的英文版原稿，他提出了很有價值的建議，我已採納。麥克斯·普蘭克研究所的阿爾伯特·克雷默（Albert Cremer）和斯捷芬·考德爾卡（Stefen Kaudelka）以及法國駐德國歷史使團的帕特里斯·維特（Patrice Veyt）閱讀了本書英文版中的〈年鑑學派〉一章。

在此，我也一併致謝。我還要感謝麥克斯——普蘭克研究所的卡爾·希維林（Karl Sieverling）用電腦協助我所做的工作。紐約州立大學洛克伍德圖書館的查爾斯·丹尼埃洛

(Charles Daniello) 經常向我提供有關圖書的出版訊息。我在牛水城大學的助手哈松和(音譯)爲我做了傑出的文書工作，並經常在學術上提供協助。感謝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非常慷慨地安排我的教學計畫，使我得以把儘可能多的時間用於研究和寫作。

本書是伍德羅·威爾遜中心所資助的一項規模更龐大的研究項目中的一部分。由於亞歷山大·馮·洪堡德基金會提供的經費，我得以在德國度過了兩年半的時間。我的妻子威爾瑪(Wilma)仔細閱讀了德文版和英文版的原稿，從而使全書的行文風格和邏輯得以保持一致，她還爲我準備了本書英文譯本的初稿。對此，我要致以特別的感謝。

Georg G. Iggers

一九九六年五月於哥廷根

目次

中文版序 / i

序言和致謝 / ix

前言 / 001

第一篇 早期階段——作為一門職業化學科的歷史學的興趣 / 033

第一章 經典歷史主義——歷史學科的圭臬 / 035

第二章 經典歷史主義的危機 / 049

第三章 德國的經濟社會史以及歷史社會學的發端 / 059

第四章 美國的社會史傳統 / 067

第二篇 中期階段——社會科學的挑戰 / 077

第五章 法國：年鑑學派 / 079

第六章 批判理論與社會史——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歷史的社會科學」 / 103

第七章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從歷史唯物主義到批判人類學 / 123

第三篇 歷史學與後現代主義的挑戰 / 149

第八章 勞倫斯·史東與「敘事史的復興」 / 151

第九章 從宏觀歷史學到微觀歷史學——日常生活史 / 157

第十章 「語言學的轉向」——歷史學作為一門學術性學科的終結？ / 185

第十一章 從九〇年代的觀點來看歷史學 / 211

結語 / 223

參考書目 / 233

譯名對照表 / 239